

# 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与文人

晏选军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金元之际, 北方中原地区成为金、大蒙古国、宋政权的争夺对象, 汉人割据军事集团乘势崛起。其中, 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等成为代表。他们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互争雄长, 而且多注意涵育文化、保护文人, 对易代之际的文学承传和发轫元朝自身文学, 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金元文学; 汉人世侯; 文人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1-0082-04

从大蒙古国太祖六年(1211)成吉思汗亲征华北始, 至其子太宗窝阔台六年(1234)灭金为止, 二十余年间, 金源与大蒙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其时, 中原板荡, 哀鸿遍野, “天马浮江, 兵强将锐, 所征无敌, 所掠无遗, 俘戮之民, 奚啻亿万?”<sup>[1]</sup>(卷四下)以至于“两河、山东数千里, 人民杀戮几尽, 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 房庐焚毁, 城郭丘墟”<sup>[2]</sup>(卷一四“金人告迁于南京”条), 战争的酷烈可以想见。贞祐二年(1214), 金宣宗被迫南渡黄河, 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居住在山东、山西、河北一带的民众为躲避兵燹, 或纷纷南徙; 或集聚丁壮, 以乡、社为单位, 推戴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为首领, 组成堡砦自守, 形成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集团, 以与“群盗蜂起河朔”的“湏汹器混”<sup>[3]</sup>(卷四七《贾德行状》)局面相对抗。

地方性军事集团几乎每到王朝更迭之际便会出现, 这种现象在金元之交似乎表现得特别突出。“太祖皇帝(成吉思汗)一举, 而金祚不守。是时, 屈伏草莽者, 齐举并起, 云会响应。”<sup>[4]</sup>(卷一六《大元故顺天路总管府权事王公神道碑》)“天造草昧, 利用建侯。豪杰之士乘时奋兴, 以取功名富贵者抑多矣。虎或鼠化, 蛇非龙讳, 亦奚以凭藉积累而为言?”<sup>[5]</sup>(卷二八《大丞相刘氏先莹神道碑》)一时间, “豪杰闾起, 于是拥兵者万焉, 建侯者万焉, 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 鸠民者、保家者, 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 积粟金帛子女以为己有者, 断阡陌, 占屋宅, 跨连州郡以为己奉者, 又各万焉。”<sup>[6]</sup>(卷二五《万卷楼记》)蒙古统治者充分认识到这些地方武装的向背对征服华北的影响, 为招抚计, 不惜给予降顺者种种特权: 主管辖区的军务民事, 生杀自专, 僚属听其自置。更重要的是,

其官爵可以由家族世袭, 颇有几分汉之郡国、唐之藩镇的意味。对于众多的地方武装领袖来说, 这种招徕政策的诱惑力是非常强烈的, 也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加上金朝其时已经是日薄西山, 气息奄奄, 失去了维系局面的号召力, 经过短时期的犹豫与观望, 一大批地方首领纷纷臣服于蒙古政权, 转变成为当时所谓的汉人世侯。较为著名的有真定(今河北正定)史天泽、东平(今属山东)严实、顺天(今河北保定)张柔、济南张荣、益都(今属山东)李璿等。

蒙金双方的战争, 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而且阻碍了文化的发展, 使金朝日趋成熟的民族融合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国初承金兵绝学之后, 文物凋敝殆尽”<sup>[7]</sup>(卷二二《元故徵士赠翰林学士谥文献杜公行状》, 377), 并非夸张之辞。而作为文化载体的所谓“衣冠世族”, 即士大夫群体, 其处境显得尤为艰难。于是, 诸如“自经丧乱, 衣冠之士逃难解散, 糊其口于四方者多矣”<sup>[8]</sup>(卷五《嵩阳野史》); “河南新破, 衣冠狼狈”<sup>[6]</sup>(卷三六《左副元帅祁阳侯神道碑》); “衣冠世族, 强者戮, 弱者俘”<sup>[9]</sup>(卷三八《傅进墓志铭》)之类的记载, 便充斥着时人后人的笔端。士人们朝不保夕, 萍漂梗泛, 生存空间变得十分逼仄, 可供他们选择的出路无非以下数端: 1) 直接为大蒙古国所用, 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但能像他们这样得到重用的机会毕竟太少, 更多的人只能沉抑下僚, 始终志不获伸; 2) 归隐林泉或遁入佛道以求全身远祸, 如李俊民、刘祁、杜瑛、河汾诸老等。顺便指出, 金元之际全真教势力在中原地区迅速崛起, 就与此一社会背景下, 大量士人托迹其中密切相关; 3) 依附各地崛起的世侯寻求庇护, 世侯幕府也因此成为他们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寄托

收稿日期: 2006-04-03

作者简介: 晏选军(1974-), 男, 湖南醴陵人, 中南大学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金元明文学与学术思想

所在。前两类是少数，大部分文人士子选择了最后一条道路。

这种选择有缘由可以探寻。在当时的普遍混乱中，汉人世侯控制区内的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减轻了军事争夺的破坏，经济文化得以继续维持和发展。并且，为培植势力与声望，那些有识见的世侯多重视文教，注意网罗人才，协助自己在势力范围内维持有效的统治。这样，不少金朝士人为避兵燹、为谋生计，纷纷投靠到大小世侯的周围。金亡前后，这些地区更成为北方文士逋逃的渊藪，聚合成大大小小的文人团体。时人所谓“方今河朔藩镇雄，衣冠往往罗其中”<sup>[10]</sup>（卷一四附张澄诗，181），即是生动的写照。在此基础上，渐次形成了文化事业相对发达的地域文人集团。其中，真定史天泽集团、东平严实集团、顺天张柔集团最为众望所归：“壬辰（1232）北渡后，诸侯各有分邑。开府忠武史公之于真定，鲁国武惠严公之于东平，蔡国武康张公之于保定，地方二千里，胜兵合数万，如异时齐晋燕赵吴楚之国，竟收纳贤俊以系民望，以为雄夸。”<sup>[11]</sup>（卷五《故总管王公神道碑》）存亡续绝之际，金代的文风、士风也借助这些庇护之所得以延续下来而不至遽然断绝。

真定史氏归顺蒙古政权最早，宪宗蒙哥时期又被封为忽必烈母子的汤沐邑，史天泽后来官拜右丞相，元代以汉人而居首相之位者，除史天泽无第二人。所以，真定史氏实可视为汉地世侯的首要代表。到中统末年世祖收世侯兵权时，“史氏子侄即日解兵柄者十七人”<sup>[12]</sup>（卷一五五《史天泽传》，3661），可见其家族势力之盛。史天泽虽与蒙古政权关系极为密切，但并不赞成蒙古贵族歧视知识分子的做法，注意延揽文人。稍后的王恽记载说：“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按指史天泽）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溥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徒单颀轩，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其张颐斋、陈之纲、杨西庵、张条山、孙议事，擢府荐达至光显云”<sup>[2]</sup>（卷四八《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可谓极一时之选。王溥南（若虚）为金末文坛盟主。李敬斋（治）是金元之际北方著名学者，金亡后流落于河北、山西间，居真定最久，晚年隐居真定元氏封龙山下，讲学著述以终。白枢判（华）与元遗山（好问）俱为著名诗人，又有通家之好，号称当世“元白”。“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即为白华之子。白朴幼时鞠育于元好问家中，十多岁即随父投靠史天泽，受到史的器重，二人结为忘年交，在其词集《天籁集》中曾多次提及自己与史天泽“欢游如平生”的深厚情谊。而史天泽本人与次子史樟，也是颇擅辞章的曲作家，《录鬼簿》中均有记载。真定

幕府集团中较有名望的文人，还有张德辉（颐斋）、杨果（西庵）等。两人俱先为史天泽幕府参议，后入忽必烈幕，翊赞忽必烈登基称帝，次第获得重用。

顺天张氏主要凭藉着显赫战功为大蒙古国及元朝所倚重，在厓山战役中直接指挥元军灭宋的大将张弘范，就是张柔的儿子。张柔“性喜宾客，闲暇辄延引士大夫与之言笑谈论，终日不倦。岁时贍给，或随其器能任使之”<sup>[13]</sup>（卷六二王磐《蔡国公神道碑》，270）。曾参与围汴之役，入城后于金帛一无所取，惟独进入史馆，取走金朝历代《实录》以及秘府图书，并访求、护送耆宿名儒十余人北归。仅此即可见出其人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他的副手贾辅也大力予以协作，“汴梁亡，朝省名士五十余人会于保下，侯皆厚为资给，尽礼延待，擢其英俊而加任使，其耆德则事之，由是四方贤士，翕然来归，冠佩蔼然，有平原、稷下之盛。故好贤之誉日隆，事之利病日益闻，政化修明，人有生赖，既富而教，駸駸乎治平之世。”<sup>[6]</sup>（卷三五《左副元帅祁阳贾侯神道碑铭》）因此，一批文人投奔到他们的幕府中，代表人物有郝经、王鹗、乐夔、敬铉等人。郝经的遭遇更是汉人世侯在易代之际护持文化血脉的一个显著例子。郝经幼年时适逢战乱，居无定所，几度“濒死”<sup>[6]</sup>（卷首附《年谱》）。后寄居保定铁佛寺刻苦攻读，张柔与贾辅闻郝经之贤，延为上宾。张、贾二人留意搜罗文献，建藏书楼，“私家之藏，几逾秘监”，让郝经登楼恣意观览，并殷殷叮嘱他说：“吾之书有归矣，吾不为书肆矣。向吾之书贮于楼中，今则贮于子之腹中。向者大圣之道布于方策，今则布诸子之心矣。子其摘光揭耀，俾吾之书用于世，以济斯民，则子之腹乃万世之府也。不然，则亦蠹鱼之冗、坠檐之楼尔。子其勉之！”<sup>[6]</sup>（卷二五《万卷楼记》）黽勉之情，溢于言表。郝经并未辜负他们的厚望，利用战乱中这一难得的学习条件，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素养。其间，他还广泛游历燕京、东平、曲阜等地，与各地名士和世侯幕宾砥砺斯文、迭相唱和，进一步增长见闻，“自是声名籍甚，藩帅交辟。”<sup>[14]</sup>（卷五《元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墓志铭》）所谓“藩帅”，其实就是各地的世侯。凭藉着自身努力与世侯及其幕僚们的延引称誉，郝经引起了尚在“潜邸”中的忽必烈的注意，并逐渐得到赏识与器重，最终成为元初名臣。

在这些文人集团之中，以东平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吸引的文人也最盛。东平地处齐、鲁、魏文化的结合点上，文化传统深蕴。严实父子在执掌军民大权的同时，一直注意发展文化和保护文人，施行“以文绥鲁”<sup>[15]</sup>（卷二引陈绎《重修集仙宫碑》，606）的策略，所以“一时名公多归焉，故东平人物之盛为诸道最。”<sup>[16]</sup>（卷一《太常徐公》，250）严实军旅得暇，日与文士觴咏游从，讲论经史。其子

严忠济后袭父爵，对待文士也礼敬有加。并善词曲，隋树森先生《全元散曲》辑得其小令二首。其中[天净沙]一调，通篇以孟尝君自况，从中多少可以窥见其收养士人的心态。在严氏父子的影响和带动下，东平行台治下诸州府的地方负责人也多注意收罗人才，涵养文化。严实部将、冠氏令赵天锡，“在军旅中，日以文史自随，延至名儒，考论今古，穷日夕不少厌”，“所与游皆天下名士”<sup>[5]</sup>(卷二九《千户赵侯神道碑铭》)；东平五翼都统领信光祖“幕府暇日，日与文士歌酒相燕乐”，购买名家书画，学赵秉文书法，颇有可观，其藏书“经史完备，虽儒素家少有及者”<sup>[5]</sup>(卷三十《五翼都统领豪士信公之碑》)；还有原潞州主州事、东平左副元帅阎珍，据元好问记载：

辛丑(太宗十三年，1241)元日，余方客东平。载之(阎珍字一一引者)盛为具，召予及大兴张圣予、祁人宋文卿、东光句龙英孺、镇人刘子新、太原崔君卿、浑源刘文季、寿春田仲德辈，饮于家之养素斋。载之先病于酒，医者戒勿饮。然其所致客皆名士，乐籍又京师之旧。饮既洽，谈谑间作，座客无不满引举白者。载之欢甚，不自顾籍，亦复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sup>[5]</sup>(卷二九《故帅阎侯墓表》)

仅从这次与宴者的籍贯，就足以窥见东平一地招致的人物，可谓四方之盛。

金亡前后，原先滞留在汴京地区的文人士大夫，或逃亡出来，或被蒙古政权编管，不少都辗转流寓到了东平境内，元好问亦在其中，且“客东平严实幕下最久”<sup>[17]</sup>(卷八，1273)。由汴京流离到冠氏(今河北冠县)的杨奂，也受到严实部将冠氏令赵天锡的热情款待。杨奂后来成为大蒙古国政权最早选拔擢用的文人之一，离开东平赴燕京时，赋诗留别赵天锡：“主人情烂熳，客子自奔忙。不见犹频梦，相逢合断肠。秋凉抛药里，夜雨倒壶觞。回首高城北，幽燕去路长”<sup>[18]</sup>(卷下《冠氏留别赵帅》)，委婉深曲，情辞真切。由于严氏父子与将佐幕僚们的共同努力，“(东平)行台所统百城，比年以来，将佐、令长皆兴学养士，骎骎乎齐鲁礼义之旧”<sup>[5]</sup>(卷二九《千户赵侯神道碑铭》)，东平一时成为人才荟萃之所。除杨奂诸人外，聚集于东平一地的还有杜仁杰、李昶、商挺、徐世隆、王磐、耶律有尚、陈膺、张澄父子、康晔以及袭封衍圣公孔元措等。东平一时成为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文化中心，史籍中所谓“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sup>[12]</sup>(卷一五九《宋子真传》，3736)，信非虚言。蒋正子《山房随笔》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杜善甫(即杜仁杰)山东名士，工诗文，不屑仕进，游严相(按指严实)之门。严乃济南望族，善甫为所敬重。一日谗者间之，情分寔乖。杜谢以诗云：‘高卧东窗兴已成，帘钩无复挂冠声。十年恩爱沦肌髓，只说

严家好弟兄。’严悟非其过，款密如初<sup>[19]</sup>(716)。

笔记野史所载，事或不实，情则有之，从中亦不难窥见易代之际士人与世侯之间关系的款洽。

不仅如此，严实还率先开办府学，延请元好问、李昶等人为师，受业者近百人，其中培养出来的阎复、徐琰、李谦、孟祺等人，号称“东平四杰”，为一时翘楚。另外，王构、魏初、王恽等，也先后在东平府学受教。受严氏父子兴学养士的影响，再加上朝廷兴学的诏令，东平路下辖各州县也纷纷兴建庙学儒学。笔者仅据《嘉靖山东通志》(天一阁藏本)卷十六统计，到至元初年，东平路各地修建的学校统计已不下三十馀所。这些学校与东平府学一样，也担负着培养选拔人才、弘扬文化的任务。东平幕府集团以府学及各地儒学为中心，源源不断地为元政府输送着俊秀之才。东平地区兴学养士的举措盛况空前，到元世祖中统年间，“内外要职之人材，半出于东原(即东平)府学之生徒”<sup>[4]</sup>(卷十《泗水县重建庙学记》)，连朝廷都称奖说：“郛(东平古称郛城)之得人，号称至盛”<sup>[20]</sup>(卷二七《文康阁公神道碑铭》)。这些人后来多半为元廷相继录用，对有元一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元代文坛宗师虞集颇有感慨地说：“我国家龙兴朔方，金源氏将就亡绝，干戈蜂起，生民涂炭，中原豪杰起于齐鲁燕赵之间，据要害以御侮，立保障以生聚，以北向于王师。方是时，士大夫各趋所依以自存。若夫礼乐之器、文艺之学、人才所归，未有过于东鲁(即东平)者矣。世祖皇帝建元启祚，政事文学之科彬彬然为朝廷出者，东鲁之人居多焉。典诰之施于朝廷，文檄之行乎军旅，故实之讲乎郊庙，赫然有耀于邦家。至元大德之间，布在台阁，发言盈朝，所谓如圭如璋，令闻令望而颀颀印印者焉。”<sup>[21]</sup>(卷三一《曹文贞公文集序》)推本溯源，其言可以据信。

各个集团不仅存在着世侯与文人、集团内部文人的相互交往，而且，不同地域集团文人之间的交流也颇为频繁密切，并非彼此封闭，互不通声气。上举郝经是一例。又如真定文人王若虚，闻东平地区尊崇文儒，“衣冠、礼乐有齐鲁之旧”，在八十馀岁高龄时，经严忠济及其幕宾精心安排，留东平十馀日，并游泰山，因年事已高而无疾终于山顶。<sup>[5]</sup>(卷一九《内翰王公墓表》)而金源一代文宗元好问在这个时期的活动尤其引人注目。徐世隆称：“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sup>[13]</sup>(卷六六《元遗山集序》，388)从金朝灭亡起，直至宪宗七年(1257)去世，元好问频繁往来于上述地区，与各大文化圈子中的文人往复赓和，诗酒留连，并直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后起之秀，厥功

甚伟。其间，除了白朴、东平四杰、王恽等人尝随从问学外，郝经与他也有师承关系。而像白华、李治、王鹗、杨奂、张德辉等人，更是他的旧交。中统三年(1262)，严实之子忠杰刊刻元好问诗文集，李治、杜仁杰、徐世隆、王鹗等都先后为之作序，可视为不同地区文人交流的典型例子。作为各个地域文人集团的联络者，元好问对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世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随着大蒙古国与金朝在争夺中原地区时暂时出现的权力真空而出现的，它的存在本身是与中央集权制度相对立的。随着金朝的灭亡以及大蒙古国行政管理体制渐趋成熟，世侯与中央政府的冲突也逐渐加剧。中统三年(1262)爆发的益都李璫叛乱，将二者的矛盾暴露无遗。平定叛乱后，元政府加大了集权化力度，罢侯置守，行迁转法，正式剥夺了世侯的兵权和世袭权。在这个过程中，元朝的京师大都凭借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基本完成了吸纳其他文人群体中优秀分子的任务，逐渐在文化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于是乎再一次随着文人群体的进退而变迁。至此，其他各文化集团的活动也随着文人们或还乡、或入仕而渐趋分散、消歇。

在金元之际兵荒马乱的年代，以真定、顺天、东平为代表的汉人世侯对文人的保护，为文化的涵育与发展提供了一片难得的绿洲，其文化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既扫除了改朝换代之际文化恹恹不振的局

面，又培养涵育了大批人才参与大蒙古国及元政权的建设，为发轫元朝自身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1] 蒋正子. 山房随笔[A]. 说郛[C].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 阙名. 两朝纲目备要[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王恽. 秋涧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胡祇通. 紫山大全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 元好问. 遗山先生文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6] 郝经. 陵川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 苏天爵. 滋溪文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8] 李庭. 寓庵集[A]. 藕香零拾[C].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9] 黄溍. 金华黄先生文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10] 刘祁. 归潜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1] 魏初. 青崖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宋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 李修生. 全元文(册二)[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14] 阎复. 静轩集[A]. 藕香零拾[C].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5] 陈垣.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A]. 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敎史论著八种)[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16] 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 [17] 赵翼. 瓠北诗话[A]. 清诗话续编[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8] 杨奂. 还山遗稿[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9] 蒋正子. 山房随笔[A]. 历代诗话[C].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0] 袁桷. 清容居士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21] 虞集. 道园学古录[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Hereditary local governor of the Han nationality with literati in the Late Chin and Early Yuan

YAN Xuan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Central north areas fell into an object which the Empire Chin, the Great Mongol Empire as well as the regime of Song eagerly scrambled for in the Late Chin and Early Yuan. Han military clans who set up a separatist regime were growing up during this situation. The Family Shi in Zhendin, the Family Zhang in ShunTian, and the Family Yan in Dongping, etc. especially represente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Not only did they stack up against each other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military affairs, but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literati. Consequently, they made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continu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originated the literature of Yuan Dynasty itself.

**Key words:** literature of the Late Chin and Early Yuan; hereditary local governor of the Han nationality; literati

[编辑：苏慧]